

学科思想史丛书

哲学社会科学系列

政治学 思想史

ZHENGZIXUE SIXIANGSHI

宝成关 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学科思想史丛书

哲学社会科学系列

政治学 思想史

ZHENGZIXUE SIXIANGSHI

宝成关 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学思想史 / 宝成关主编. —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学科思想史文库)

I. 政... II. 宝... III. 政治学—历史 IV. 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7952 号

学科思想史文库

政治学思想史

宝成关 主编

责任编辑: 陈 凯 赵匡莉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 <http://www.hnepb.com>

电子邮箱: postmaster@hnepb.com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 印刷

787×960 16 开 印张: 43.25 字数: 640000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55-4402-9 / G·4397

定价: 64.2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丛书总主编：汝 信

丛书总策划：陈民众

本书组稿：陈 凯

本书责编：陈 凯 赵匡莉

汝 信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湖南教育出版社的策划、组织和支持下，《学科思想史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我国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著作中，从学科的角度去探讨学术思想的发展尚不多见，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按原来的设计，这套《学科思想史丛书》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丛书的宗旨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并重，这也是它的鲜明的特点之一。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有不少人对哲学社会科学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 and 作用是认识不足的。他们往往从狭隘的实用的观点出发，错误地认为哲学社会科学没有多大用处，因此他们比较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而忽视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轻视那些从事基础性研究的人文学科。这样，就在社会上造成“重理轻文”的倾向，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十分不利。针对这种错误认识，党中央和江泽民同志近年来曾多次强调指出，要从整个国家建设和发展需要的高度去正确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必须同样重视发展科技和哲学社会科学，并提出了“四个一样”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振兴，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之林，不仅需要大力发展自然科学，而且同样迫切需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举，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和理论可循。这就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断探索，在丰富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又把新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在这个实践和理论的循环往复的双重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都应积极参与和发挥作用。再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应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奠定思想基础，是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直接影响到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推动全社会的文明向前发展。所以江泽民同志明确地指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这两个“不可替代”，充分说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所应有的位置。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又再次重申，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学术界正在努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十六大的精神，加强和加快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大好形势正在形成。《学科思想史丛书》的出版，对于广大读者了解哲学社会科学一些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而加深理解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顾名思义，学科思想史是以学科为研究对象去探索该领域内学术思想的发展，从学科成长的历史和现状中去揭示思想演进的线索和轨迹。它和学科本身的历史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所区别。学科史着重描述各个历史时期内该学科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并给予适当的评价，而学科思想史则把研究重点放在与学科发展相应的学术思想、观点、方法上。在某种意义上说，编写学科思想史可能比学科史的难度更大。出版《学科思想史丛书》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从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来看，它的各个学科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在历史上，这些学科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认识的前进步伐而发展演化的。认识起源于实践，正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人类逐渐增加对自然、社会和人自己的认识，开始由零散、片断、肤浅而后来则越来越深化、系统化，最终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而构成独立的学科。一般地说，人类早期的认识往往是综合性的，涵盖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在有些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有关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虽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但还没有分化成各个独立的学科。例如，在古代希腊早期思

想中，后来被人称作“哲学”的“爱智慧”这个词，实际上就包括了当时的所有知识和学问，从天文、地理到人生哲理、宗教、讲演、修辞、写诗、治病等等几乎无所不包。那时不仅没有各个独立的学科，甚至连学科的概念也还没有产生。柏拉图开始意识到各门知识之间应有所区别，所以他在各别的对话中专门讨论某个方面的问题。但是，真正对各门学科作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的还是亚里士多德。他集古希腊学术之大成，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巨人。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他明确地把知识分为三大类：理论的、实践的和创制的。理论知识又可分成三类：哲学、数学和物理学。实践知识也分为三类：伦理学、政治学和家政学（即经济学）。创制知识则包括诗学（文艺创作）和修辞学。亚里士多德还系统地研究了逻辑学，把逻辑学看作研究一切知识的必要的思想工具。他具有十分渊博的知识和学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几乎对哲学和科学文化的各门知识都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使它们初具学科形态，他可以说是许多学科（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而且也包括自然科学）的创立者。

在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十分缓慢，甚至陷于相对停滞的状态。神学在中世纪的欧洲占绝对统治的地位，这对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也明显地阻碍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正常成长。当时的文化教育机构为教会所垄断和控制，教会学校以神学教育为主，设七门必修学科，即所谓“七艺”，包括文法、修辞、逻辑（称“前三艺”）和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称“后四艺”），更高级的教育则只有供少数人深造的神学。一些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也只有借着神学之名在神学所允许的范围内来研究探讨，这样的话，当然也不可能建立起独立的学科。直到12世纪后欧洲世俗性的大学大量出现，开始打破教会对文化教育的垄断，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善。在欧洲基督教世界久已失传的许多古希腊罗马文化典籍，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不少著作，靠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维护才得以保存和研究，如今通过翻译又重返欧洲各个大学。大学的创立是当时教育体制和科学研究方面的重大变革，它改变了以前宗教教育

的封闭狭隘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传授“七艺”和神学知识，而开创了一种规范的世俗化、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并且成为新的科学研究的中心。大学按专业设立一些学院，增加不少世俗实用学科，为社会培养大批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人才，也把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哲学社会科学真正的大发展以及各门学科逐步成熟而最终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主要地却发生在 17、18 世纪以后。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欧洲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则揭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欧洲社会的面貌，无论从经济上或政治上都造成了影响十分深远的巨大变革。新的形势向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社会变革而产生的大量新问题迫切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从理论上做出新的解释并在实践中加以解决。这不仅使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传统学科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且还促使一批新学科的诞生。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以后，人类历史发生巨大变动，哲学社会科学迅速发展，对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一些新兴学科正方兴未艾，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

纵观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学科的产生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它们本身是历史的产物。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上层建筑 and 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其本身的发展有前后继承的关系，但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基础制约并为之服务的。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形成必须有思想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充分积累，如果没有这种积累，一个独立的学科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学科的建立往往是一些杰出的学者在前人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发展的结果，对有的学科来说，学者个人所起的作用确实是十分巨大的，我们今天研究学科思想史也离不开探讨那些杰出人物的学术思想。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发展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需要。恩格斯说过，由于社会需要而推动科学前进的力量胜过十所大学。这是至理名言，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而且也同样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在近代和现代出现并得到蓬勃发展的一些学科如社会学、

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传播学等等，正是充分的明证。首先是有强烈的社会需要，存在着不得不认真地研究解决的紧迫的社会问题，才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学科的成长。研究学科思想史，不能单纯地从思想到思想，而必须紧密地联系社会实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去探索思想发展的脉络。

当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科发展一直在继续进行，呈现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趋势。首先是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学科研究的不断分化和不断综合的趋势在同时发生。一方面，由于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学科研究的分化和越来越专门化日益加剧，不断分化的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又不是某一门学科能单独解决的，而需要多学科的广泛合作，综合应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问题进行整体化的研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当然，现代科学科学的这种综合化趋势，是在各个学科的进一步分化和高度专门化的基础上出现的，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除了由学科分化产生的分支学科外，又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领域，即使某些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学科，也通过与其他学科的结合而衍生出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这种丰富多彩的局面是过去从来没有的。

其次，另一个重要趋势是两大科学门类，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正在不断加强。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正在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去，而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新成就、新思想也反过来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当代某些最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正是出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和相互联系的交叉点上。应该说这是一个有益的发展趋势。广义的科学本来就包括关于自然界、社会 and 人的研究，因此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应该是相互协调和相互统一的。过去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离，在当时历史条件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确实有力地推动了自然科学的独立发展，摆脱虚幻的自然哲学的影响，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经过长时间的分离和独立发展，现在也许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重新结合起来的时候了。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因此自然科学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他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①当然，从目前看来，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融合决非一日之功，但这是否代表未来学科发展的大方向呢？恐怕只能由历史来证明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8页。



—

政治学作为人类思维与社会实践之产物，是一门很古老的学科。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存在人类，并且存在着集体生活，人类自身就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政治学就是“人类为有意识地去理解和解决集体生活和集体组织的种种难题而作的尝试”^①。从这种意义上说，中西方都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政治学传统。不过，由于中西方各自的文明形态、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不同，故在对政治学的表达以及具体应用上，自然存在着很多差异。要真正理解与认识这些差异，通过对中西方政治学思想史的学习，便可以窥其概貌。但是，在了解中西方政治学思想史之前，我们须先弄清政治学思想史的定位、特点与内容。

所谓政治学思想史的定位，实际上就是回答政治学思想史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看来，要说明什么是政治学思想史，关键要知道它与政治学学科发展史、政治学说史（政治思想史）是什么关系。大致说来，政治学思想史是介于政治学学科发展史和政治学说史（政治思想史）之间的。因此，我们要明白政治学思想史是什么，又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政治学学科发展史，什么是政治学说史（政治思想史）。

在我们看来，政治学学科发展史就是论述政治学学科萌芽、产生、发展、嬗变及其革新和社会影响的历史。也就是说，它主要侧重于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成长历程，这就包括政治学研究范畴的确立、政

^① 乔治·萨拜因著：《政治学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页。

治学研究方法的形成、政治学研究组织机构的产生、政治学研究队伍的发展、政治学研究与其他学科发展的关系、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实践之关系等。政治学说史（政治思想史）则是阐述人类政治思维结晶的历史，它主要包括人类对政治本身的认识、对政治生活设计的思考、对政治生活变迁的理解、对政治理想追求的表达、对人类政治生命的各种体察以及对政治生活与社会其他生活关系之体认等。作为介乎上述两者之间的政治学思想史，它一方面要关注政治学学科发展史，但主要侧重于政治学研究范畴与政治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要顾及政治学说史（政治思想史），但主要侧重于对政治生活设计与政治生活变迁之理解。由于政治学思想史的这种居间性，使得它既表现出政治学学科发展史的特点又表现出政治学说史（政治思想史）的特点。这就是说，政治学思想史必须展示政治学这门学科自身研究范畴与研究方法上的独特之处，又要揭示人类对政治生活安排与政治生活变迁认识的成果。基于政治学思想史的定位和特点，政治学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政治学科学的研究范畴与研究方法是什么？

二是人类（主要是政治思想家们）关于政治生活思考的结晶有哪些？

既然政治学思想史主要包括上述两大内容，那么，我们学习它，主要有什么目的呢？我们认为，其目的有：

一是了解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促进政治学学科的不断发展；

二是了解中西方政治学思想史的主要内容，改进人类政治生活的质量，提升政治文明，传承并发展政治文化的优秀成果；

三是丰富人类思维产品，提高人类政治思维水平，拓展人类生活的价值空间。

二

如前所述，政治学有着古老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中西方又表现出各自的特色。而要了解这些特色，我们实有必要对它们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及其特征进行一番梳理。

西方政治学思想史到底有什么特色呢？我们认为，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1. 西方政治学有哪些传统（或流派）？其中占主导的传统是什么？

在我们看来，西方政治学自古希腊罗马以来主要存在着两大传统：君主政治传统和民主政治传统。这两大传统在西方各个历史时期与不同的区域并非均衡发展。大致来说，从古希腊罗马至近世，主要是君主政治传统占主导，但是民主政治传统时隐时现，并未间断。不过，这种占主导的君主政治传统在西欧的一些国家相对于欧洲大陆国家来说，要弱小一些。易言之，西欧地区的民主政治传统并不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它一直在与君主政治传统进行着顽强的抗争。由于这种情形，自欧洲近世以后，西欧地区的民主政治传统渐成大势，并逐渐遍及欧洲大陆。自此之后，西方以民主政治传统为主导，尽管一些国家至今保留君主，但都在很大程度上和相当大的范围内吸纳民主政治传统，蔚然成风。

2. 西方政治学的各个历史时期探讨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中有无一些基本相同的研究范围？

我们认为，基于人类本身的需求大体一致，他们面临的生活处境也呈现很多相似性，西方政治学不管在哪个历史时期，都不能回避以下的问题：对政治生活的思考，对政治制度的寻求，对政治理想的期待，集中表现为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认知和处理。正是由于这些主要内容的不容隐藏，西方政治学无论古今又存在着一些基本相同的研究范畴：

- 一是对人的思考；
- 二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的思考；
- 三是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思考；
- 四是对政府形态的思考；
- 五是对优良政治生活的向往与思考等。

概而言之，这种研究范畴集中表现为三个层面：政治哲学、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总的来讲，这三个层面在西方政治学思想史上贯彻始终，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国度，这三个层面的表现有所差异。一般而言，在欧洲大陆的一些重思辨的国家里，它们在政治哲学方面表现甚著，尤其是在历史剧变的年代。而在那些稳重而务实的国家里，则注重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之探讨。还有，在君主政治传统居于主导的时候，政治哲学主要表现为对神（或上帝）与君主、臣民三者关系的思考，它力图寻求（依托于神权的）君权至上的合法性原理。在民主政治传统占主导之际，政治哲学则转向权利与权力之关系的思考，它力图实现政治生活的正义。换句话说，西方政治学的三大研究范畴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寻求某种公正；二是改善政治生活。

3. 西方政治学在各个发展阶段呈现何种特征？这种特征，有无连续性？

我们以为，西方政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表现出某种主导性特征。大致而言，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政治学的主导性特征是城邦；进入中世纪时代，它的主导性特征是教会与神学；到了近世之后，它的主导性特征则是民族国家与公民；随着科学技术之革新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它的主导性特征渐趋全球化。尽管西方政治学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主导性特征，但是这些主导性特征也存在着某种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则集中呈现为对政治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由于西方人民生活环境的变迁又表现出不同的关注重心。

4. 西方政治学在各个时期，其研究方法有何特征？

总的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在每个时期都表现出综合性特征。也就是说，研究政治学的方法，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学科融

合的。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其研究方法又呈现出某种主导性特征。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整体主义的政治思维和归纳的实证性研究是其典型特征；在中世纪，教条主义的经典思维和繁琐的诠释论证是其主要特点；近世以后，个人主义的理性思维和经验的实用分析是其显著特色。进而言之，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多借助于哲学思维；在中世纪，它又依附于神学思维；而近世以后，它借助于个人的主体性与理性。

5. 西方政治学在各个历史阶段，其理论与现实功能如何？它在“政治思想家—政治家—公民”三者之间居于何种地位？

在我们看来，西方政治学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其理论功能是服务于哲学理论的发展，其现实功能在于论证城邦政治的合理性，最终追求一种善性的实现。它在中世纪，其理论是服从于神学理论，而现实功能在于证明教会（教权）的合法性，最终希望一种神性的实现。它在近世之后，其理论是服从于自己，也就是它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栖身之所，而现实功能在于说明权利与权力的合法性，最终期望人的主体性与自由本性的体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政治学基本上是属于政治家的专利，因为那时对政治学的思考主要是哲学家作出的，公民远离政治学的探讨，但是政治家们都热衷于政治。另外，即使哲学家们对于政治学有着惊人的智见，政治家们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对待政治学的。换句话说，西方政治学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在“政治思想家—政治家—公民”三者之间并未获得一致的认可。进入中世纪以后，教会的势力强大，政治思想家、政治家与公民基本上都认可政治学，不过是一种神学政治学。自近代以后，政治学真正摆脱了哲学、神学的束缚，政治思想家从理论上探讨政治学，政治家则从实践上运用政治学，公民从内心关怀政治学，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都认同政治学，其主流是民主政治。从政治学在“政治思想家—政治家—公民”中的地位来看，一种政治学要形成一种主流政治学，大体来讲，须具备以下三条：有生生不息的政治思想家队伍；有矢志不渝的政治家群体；有广泛的忠实的普通信徒。

6. 西方政治学与宗教信仰之关系如何？

在我们看来，西方政治学与宗教信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这并不表示西方国家力行政教合一。恰恰相反，许多西方国家都推行政教分离的国策。但为什么又说它们保持着密切之关系呢？这主要是从二者相激相荡的紧张关系来说的。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存在着多神教与一神教之争，因而君主政治传统与民主政治传统的斗争也表现得相当激烈。在中世纪，基督教一统天下，君主政治独占鳌头，民主政治居于潜流。但是，基督教的教义表现出某种宽容与开放，使得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精神如重视个人自由保留其中。直到近世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基督教表现为多元性的统一，即统一于上帝。这种“多元性的统一”的特征，使得人们对君主政治的反抗日趋强烈，通过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政治终于占了上风。但是，民主政治并不排斥基督教，相反，二者统治着不同的领域，保持一种有序的紧张关系。了解这些后，我们就会明白，近代以后的西方，为何民主政治居于主导，而基督教并未消沉下去。由此我们也可推导出西方政治学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民主政治的思想家大多都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其政治理想与宗教关怀并不相悖。

大致说来，西方政治学发展到当代，呈现出以下特点：

- (1) 研究范畴并没有质的变化，这说明其强大的持续的生命力；
- (2) 研究范式日趋多样，而且派别林立；
- (3) 民主政治传统尽管是主流，但它并不能全然消灭君主政治传统，而是出现合流的趋向。

三

西方政治学思想史的大体情形已如上述，中国政治学思想史较之又会有怎样的特色呢？

中国政治学自先秦“原典时代”以来就存在一种王权主义传统，即君主专制政治传统。这种传统尽管其中又呈现出不同的学派如儒、道、法等，但是其政治理想基本上都是为王权服务的，是典型的“王学”。当然，君主专制政治传统在中国的不同朝代又表现出不同特征。一般而言，在动乱年代，一些邦国的君主专制政治传统透露出开明的气息，不过，其目的多为自保或开疆辟土，一统天下。而在和平年代，如若遇到明君，则君主专制政治传统也会弥漫着一种“民主”的色彩。但这并不能改变我们对中国“王权主义”政治传统的总体估价。从历史上看，这种政治传统由于没有其他与之相竞的政治传统并存，一直到近代，它都保持着独步天下的“霸主”态势。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有着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主义传统。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渐侵中土，其政治学也挟力而至。由是之后，在中国士大夫的论著中，才会时常发现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叙述与议论，君主专制政治传统开始面临西方政治理论的挑战，但因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积淀厚重，故这种“挑战”并非根本性的。西方学说的“进入”经历了一个漫长坎坷的发展过程。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政治学的很多学说都在中国土地上一展风采。其中民主政治学说，作为一股强劲的实力，冲击着君主专制传统。晚清以至民初，西方政治学各种流派，诸如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均粉墨登场。五四运动之后，伴随着启蒙主义旗帜的高扬，君主专制政治传统基本崩溃，中国政治学变为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主流）、民主政治（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等多元分立的局面；不过，民主政治始终处于弱势。经过先进中国人执著的追求和选择，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开始在中国安家落户，并科学地指导中国现实的政治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三民主义政治学独占中国台湾，社会主义政治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代表主导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在中国台湾处于反对派地位，在中国大陆渐趋沉寂或成潜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主政治在学理探讨方面可以说是异常活跃。在我们看来，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又一次西学东渐浪潮洗礼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